

汪师韩“孙樵古文伪作”说驳正*

——兼及《孙文志疑》的学术价值

丁 恩 全

内容摘要: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提出的“孙樵古文伪作”说存在重大缺陷,这一观点没有版本依据,从汪师韩所谓伪作中可以考查孙樵行迹,且汪师韩未能较为合适地评论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。然而,汪师韩精研孙樵作品,对孙樵研究也做出过巨大贡献,具体表现在注释成就很高,对其所认定的孙樵作品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关键词:汪师韩 《孙文志疑》 孙樵

汪师韩(1707-?),字抒怀,号韩门,浙江钱塘人。著《孙文志疑》,是其研究唐代文人孙樵的代表作,收入《丛睦汪氏遗书》,光绪十二年(1886)秋八月钱塘汪氏刊刻于湖南长沙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。

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有一个重要结论,《经纬集》(又名《孙可之文集》)收录的三十五篇文章中,只有《复佛寺奏》、《读开元杂报》、《书褒城驿》、《刻武侯碑阴》、《文贞公笏铭》、《与李谏议行方书》、《与贾秀才书》、《孙氏西斋录》、《书田将军边事》、《书何易于》十篇是孙樵作品,“外此胥伪撰也”;汪师韩又推测,“其伪撰乃出宋人”。所以,《方輿胜览》引用了《龙多山录》,方回《瀛奎律髓》记载李朴的《乞巧诗》,诗中用了“齜舌”二字,都是不能相信的^①。汪师韩立论的根据,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二条:一是现有《经纬集》版本与唐宋时期典籍所载卷帙不合;二是除以上十篇外,其他篇章语言水平不高。对此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已有不同意见:“汪师韩集有《孙文志疑序》一篇,因谓樵文惟《唐文粹》所载……十篇为真,余一十五篇皆后人伪撰,然卷帙分合,古书多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《孙可之文集校注》(13FZW011)、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《晚清近代文章学著作研究》(2012CWX01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汪师韩:《孙文志疑序》,光绪十二年(1886)钱塘汪氏刻本,叶一。

有,未可以是定真伪。且师韩别无确据,但以其句字格局断之,尤不足以为定论也。”^①但是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汪师韩观点的错误。

我们认为,汪师韩的认识有以下不足:

第一,没有版本依据。

汪师韩《孙文志疑·凡例》称他所见到的孙樵文集刻本有吴舛本、闵齐伋本、储欣十大家本,除此外均为钞本,汪师韩自己也认为这些钞本“讹谬甚多”。最为关键的是,汪师韩没有见到宋本《孙可之文集》,判断难免出现失误。已知宋蜀刻本《孙可之文集》有两种——刘体仁藏本和海源阁藏本——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,篇目卷数与今传《孙可之文集》相同。而且,宋时《孙可之文集》本来就有三卷本和十卷本两种。至于卷次、卷数有别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说法是有道理的,“卷帙分合,古书多有,未可以是定真伪”。《龙多山录》是汪师韩判定宋人伪撰的重要依据,这篇文章北宋元祐七年(1092)就已经刻石,国家图书馆还保存有拓片,都可以证明《龙多山录》不是伪撰。

第二,汪师韩所谓二十五篇伪作中,可以考察到孙樵事迹。

《复召堰籍》、《寓汴观察判官书》汪师韩认为是伪作。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,李光富、傅璇琮、陈文新都判定《寓汴观察判官书》创作于大中元年,李光富、傅璇琮判定《复召堰籍》创作于大中三年,陈文新判定《复召堰籍》创作于大中元年,实际上,这两篇文章的创作时间都是大中三年^②,大致情况是李胤之在襄阳作卢钧属官时,辅佐卢钧修复召堰,为当地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孙樵从卢庠那里了解到李胤之的事迹,“惜李从事之迹不为人知,作《复召堰籍》”。卢钧任汴宋观察使、汴州刺史时,又聘请李胤之作属官,孙樵希望李胤之发挥自己的作用,整治唐代社会军人干政的政治弊端。如果这两篇文章是伪作,逻辑也太严密了。

第三,囿于成见,汪师韩难以正确评价孙樵古文创作的艺术成就。

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卷四认为《兴元新路记》就像“账簿”,比不上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等游记文。是否能够比得上柳宗元的游记散文,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;可是把《兴元新路记》比作“账簿”,却不是十分合适。汪师韩对《兴元新路记》的写作背景了解不深刻,对此文的意义阐释自然不到位。实际上,《兴元新路记》是一篇议政杂文,针对性强,又具有时效性,是“记”体文中较有特色的文章。《旧唐书·宣宗纪》和《唐会要》记载,大中三年(849)十一月,文川谷路(也就是兴元新路)修成,主持修路的官员,《旧唐书》记载是“东川节度使郑涯、凤翔节度使李玘”,《唐会要》记载是“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、

①永瑤、纪昀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一《孙可之集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299页。

②丁恩全:《孙樵〈寓汴观察判官书〉写作年代考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9年第1期,第50页。

凤翔节度使李玘”^①。《唐会要》还记录了兴元新路的损坏时间是大中四年六月,损坏原因是山水冲毁。

李光富和傅璇琮根据《旧唐书》和《唐会要》的记载,判定《兴元新路记》创作于公元849年,也就是唐宣宗大中三年^②,与文中讨论事件不太符合。文章末尾谈到了“朝廷有窃窃之议,道路有唧唧之叹”,兴元新路修成时,《旧唐书》记载宣宗曾“下诏褒美”,“窃窃之议”和“唧唧之叹”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,只有当新开的文川道“为雨所坏”时,才会出现“窃窃之议”和“唧唧之叹”。所以,这篇文章应该写于文川道“为雨所坏”后。则此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大中四年,具体说,就是该年春汛导致新路破坏之后。大中四年六月之后,文川道废弃,唐中央关于文川道的争论也应该结束了,“窃窃之议”和“唧唧之叹”也无必要了。陶喻之认为,《兴元新路记》可能是分成两个阶段写成的,第一个阶段是大中四年春夏之交,第二个阶段是获悉文川新路被废时,相应的,前一阶段写作是“逐日记程”,后一阶段是“感怀”^③。这篇文章是否是分两次写成,目前没有证据证明。从《孙可之文集》看,孙樵频繁往来于川陕,曾经详细记录过兴元新路的道途情况。可见孙樵作过非常扎实的准备工作,又在“窃窃之议”和“唧唧之叹”的激发下写作了这篇文章。他及时调查评论兴元新路事件,是希望借此影响唐中央的^④。

汪师韩认为《出蜀赋》的写作“铺叙”川陕路途篇幅多,寄寓的感慨少。《出蜀赋》与《兴元新路记》在写法上,都是颠倒了主体部分和次要部分位置,这种写法在我国传统文章创作中是常见的。孙樵《出蜀赋》采用这样的写法,一是因为汉赋传统“劝百而讽一”写法的影响;二是因为蜀道的艰难反衬出科举士子的心理反差。而《兴元新路记》采取这样的写法是客观所需,孙樵必须详尽地写出兴元新路道途情况,才能印证自己的看法。

汪师韩认为《武皇遗剑录》结构和思想都是粗俗的,也是因为没有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。孙樵在《武皇遗剑录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唐武宗的成就:击败回纥,“靖胡尘于塞垣,复帝子于虏庭”;平定刘稹的叛乱,“克大憝于山东,枭渠魁于国门”;对于佛教,“驱群髡而发之,毁其居而田之”,虽出于爱好道教之私,但也是有利于百姓之事。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评价唐武宗:“开成中,王室寢衰,政由阉寺……昭肃以孤立维城,副兹当壁,而能雄谋勇断,振已去之威权,运策励精,拔非常之俊杰……足以蹈章武出师之迹,继元和戡乱之功。”两相对

①刘昫:《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625页。王溥:《唐会要》,中华书局,1955年,第1574-1575页。

②李光富:《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2期,第66页。傅璇琮: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,辽海出版社,1998年,第312-313页。

③陶喻之:《唐孙樵履棧考》,《文博》1994年第2期,第58页。

④丁恩全:《孙樵〈兴元新路记〉创作艺术评析》,《名作欣赏》2011年第6期,第21-24页。

比,孙樵对唐武宗的评价是历历可信的。孙樵此文写于会昌六年(846)十一月,唐宣宗即位七个月后,希望唐宣宗能够继承唐武宗的志向,“与天下终始”。但唐宣宗即位的第二个月,即贬逐李德裕,孙樵此文称颂会昌之政,同时也是歌颂李德裕,是和唐宣宗唱反调的。汪师韩曾批评此文“俗笔”,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,能够正确评价唐武宗的成就,并规劝唐宣宗改变自己的做法,是非常危险的,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。

即使是《康公墓铭》,汪师韩也认为远逊于《书何易于》,更比不上韩愈,而不及之处在于,《康公墓铭》虽然采用顺次叙述的方法,却没有把康公的精神品质写出来。孙樵此文确实是“逐段顺叙”,但孙樵笔下的康僚,精神品质就体现在一个“直”字。所谓“峭独不顾”,所谓“宰相莫能回其笔”,都突出了其人“直”的品质,而在对康僚的遭遇叙述中又饱含热情,不乏批判的锋芒。

汪师韩认为《逐寇鬼文》、《乞巧对》、《骂僮志》三篇文章思想上语言上模拟之迹明显,是“大类于俳者”。当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,郭预衡《中国散文史》肯定了这三篇文章的批判色彩:“《寓居对》、《乞巧对》、《骂僮志》等,虽有模拟《解嘲》、《逐贫赋》和《进学解》的痕迹,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实有新的现实感受。”“孙樵本是守道之士,但在世风极其恶劣的时代……去善为恶,弃正归邪,这是十分愤慨的。”^①

鉴于以上认识,我们认为“孙樵古文伪作说”不能成立。

二

张舜徽非常认可汪师韩的经史考证,称赞汪师韩的《韩门缀学》“语多精到”^②。如果抛开“孙樵古文伪作说”这一明显缺陷,则汪师韩的孙樵之研究也是有不小贡献的。虽然因为没有看到宋本,汪师韩的文字校勘价值大减,但他的训诂成果以及他对孙樵部分作品的评价,水平还是非常高的。

1.《孙文志疑》的注释成就

《孙可之文集》的笺释评点,孙耀祖、孙道刻于明崇祯十二年(1639)的《经纬集笺评》是较早的一部,但是成就不高。成就较高的是储欣《唐宋十大家全集录·可之先生全集录》,其中的“备考”,简要注释了人名、地名、历史事件,初步探讨了孙樵散文的艺术成就,认为孙樵是继李翱之后的又一古文大家^③,结论非常中肯。此后,汪师韩的《孙文志疑》就是代表性著作,汪师韩自称“余自少见而好之,反复熟读”^④,可见其研究孙樵古文用功之深,故而汪师韩注在

^①郭预衡:《中国散文史》(中册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319页。

^②张舜徽: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六《上湖分类文编》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66页。

^③储欣辑,孙樵著:《唐宋十大家全集录·可之先生全集录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第404册,齐鲁书社,1997年,第789页。本文所引储欣评语都出自此书,不再详注页码。

^④汪师韩:《孙文志疑序》,叶一。

许多方面超出了储欣。

储欣的“备考”简明扼要地注释了文章中涉及的人名、地名。如《出蜀赋》注“筹笔”为“驿名，诸葛武侯屯田积谷处”、注“鸡幘”为“岭名”、注“大散”为“关名”，《与王霖秀才书》注“《华山赋》”为“杨敬之作”、注“冯常侍”为“冯宿”、注“玉川子”为“卢仝”，《书田将军边事》注“临邛”为“今邛州”、注“沉黎”为“今黎州”、注“越巂”为“今为卫，亦名严州”、注“南康公”为“韦皋”，《逐疟鬼文》注“陈万年”为“善事人，以丙吉荐，为御史大夫”、注“和长舆”为“晋和峤富敌国，杜预谓为有钱癖”、注“司马安”为“见《史记·汲黯传》，黯姑姊子也。安文深巧宦，官至九卿”，都准确简当。

储欣没有注出的，汪师韩做了注释。以《唐故仓部郎中墓志铭》为例，河东裴公、窦公，储欣没有作注，汪师韩做出了注释。同时，汪师韩不妄注，如冯审、刘公，汪师韩都老老实实地说明不了解情况；李公，汪师韩说明李讷作盐铁转运使时间不详^①。把已知和未知的情况区分得很清楚。

而且汪师韩的注释往往比储欣详尽，如《与高锡望书》中对蔡义的注释，不仅指出出处，而且简述生平：“《汉书》：蔡义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……擢光禄大夫、给事中。次岁，拜为少府，迁御史大夫，代杨敞为丞相。义为丞相时，年八十馀……常两吏挟夹乃能行。”^②

储欣几乎没有对历史事件做出注释，汪师韩则注释得极为周详严密。特别是对于唐代府兵制的演变、马政的演变，汪师韩的判断也极为精审。如《大明宫赋》中“籍甲其虚，有垒而墟”句下有注：“开元中，籍府兵。”汪师韩特别指出：“自高祖武后时，天下久不用兵，府兵之法寢坏……至开元乃益耗散，十二年遂变为彍骑。天宝以后，彍骑之法又稍变废……是府兵法坏于开元，此篇自注云……盖犹指唐起始置军府时而言，不当云开元中。”^③《大明宫赋》中“西垣何缩，疋马不牧”句下有注：“开元中……陇西、平凉、天水、金城四郡，息马疋至七十万。”汪师韩注则详细指出唐代马政发展的历史事实，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高宗麟德年间，是唐代马政最好的时期，从唐高宗永隆年间开始，马政“颇废”，唐玄宗开元初，“国马益耗”；所以注中所言开元中马政是错误的。《孙可之文集》中的注文，不知何人所注，吴鼐的石香馆刻本认为是“自注”，今人一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都是孙樵自己所注，结合汪师韩对府兵制和马政演变的注释来看，并不尽然；所以汪师韩注也提示我们，对于《孙可之文集》中注文的作者问题，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考察。

此外，汪师韩的注释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。《与高锡望书》中谈到的周繆，很难查找。汪师韩注曰：“周繆当作周仁。《史记》：郎中令周文者，名仁，以医

^①汪师韩：《孙文志疑》卷八，叶五。

^②汪师韩：《孙文志疑》卷二，叶四。

^③汪师韩：《孙文志疑》卷一，叶四。

见。景帝为太子时,拜为舍人……景帝初即位,拜仁为郎中令。仁为人阴重不泄……以是得幸,景帝入卧内,于后宫秘戏。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,仁尚为郎中令,终无所言。武帝立,仁乃病免,以二千石禄归老。子孙咸至大官矣。”^①复核孙樵文章所言之意,汪师韩的注释是能够成立的。

对于储欣已经作出的的注释,汪师韩也能有所推进。比如《萧相国真赞》中的萧相国,储欣推测是萧瑀,很明显是有问题的,萧瑀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,根本就没有“再安宗祏”的机会。汪师韩找到了四位唐代的萧姓宰相,宣宗时期的萧邺大中十一年(857)到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懿宗时期的萧寔咸通五年(864)到六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还有僖宗时期的萧仿、萧遘,汪师韩没有明确判断萧相国是谁,但比较储欣,已经推进了一步。当代学者李光富进一步判断萧相国是萧遘^②,就是在汪师韩的判断基础上做出的研究。李光富的立论虽不稳妥,但萧相国是萧遘这一判断大致是对的。

2. 汪师韩对孙樵部分古文的艺术性有深刻见地

下面仍将汪师韩和储欣的认识加以比较,以见汪注的价值。

关于《复佛寺奏》,储欣认为孙樵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,就这篇文章的水平来说,即使是贾谊、晁错、赵充国也超过不了孙樵。汪师韩则评曰:

按,史称懿宗奉佛太过,常于禁中饭僧,亲为赞呗……赐安国寺僧,辄逢八饭万僧。当时上疏切谏者独一李蔚,帝不听,但以虚礼褒答,其称引狄仁杰、姚崇、辛替否,以本朝名臣启奏之言谨奉佛初终之要,所称切当之言有四,虽极讥病时弊,然皆援古为说,未如此文之了辨警策也。宪宗时,独一韩文公,懿宗时,独一李茂休,以高锡望之贤,曾不闻以此书入奏,使人叹谏诤之难,岂不惜哉?文公辨在佛,故言其无福;可之辨在髡,故明其有害。立说不同,而理则无二,并宇宙不朽之文。^③

汪师韩查阅了唐代辟佛奏章,发现仅李蔚、韩愈、孙樵各有一篇,这就自然显示出其批判精神之可嘉;而这三篇文章中,韩愈、孙樵的文章更加突出,但二者立论不同,尤揭示出孙樵此文独特性。

储欣评价《读开元杂报》,说明了孙樵的文风是“怨”,又概括出了孙樵此文“怨”的原因是孙樵内心“哀以思”,评论仅有七个字,概括性很强。汪师韩则点出此文的行文笔法,前后照应,结构严谨,首尾都落笔到“开元杂报”上,写法上采用“近事”、“开元事”两两对照的方法,从而显示出开元盛世的盛况,反衬出唐末的政治腐化,进而体现出作者的感慨,把研究推进了一步。与此类似的是《文贞公笏铭》,汪师韩点出这篇铭文押韵上的特点是“押三笏字”,

①汪师韩:《孙文志疑》卷二,叶四。

②李光富《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2期,第67页。

③汪师韩:《孙文志疑》卷六,叶四。

不避重复,“风神益跌宕”,非常奇特。但是孙樵又是“意到笔随”,显得自然而然。汪师韩着重写出孙樵文章艺术上的突出之处,与储欣“冲斗贯日之词”的评语相比,显得更为深刻。

又如《书何易于》,储欣强调的是孙樵两个方面的特点,一是“史才”,一是“储思必深”。所谓史才,指何易于“治益昌”的“美哉观止”;所谓“储思必深”,指此文的结构艺术,储欣认为读《书何易于》,就像“游名山大川”,“治益昌”和“考绩”两部分,一扬一抑,一写何易于才能品格之高,一写仕途之不顺,两相对比,衬托出“胸中块垒不平之气”。储欣评论可谓精当。汪师韩又别出心裁,从语言艺术上详加探究,把孙樵文章和《新唐书·何易于传》加以比较,显示出孙樵文章创作水平之高。《书何易于》中“裴公尝从观其政,导从不过三人,其合易于廉如是”,《新唐书·何易于传》作“刺史裴休尝至其邑,导侍不过三人,廉约盖资性云”,似误裴公之导从为何易于之导从;《书何易于》中“观察使闻其状,以易于挺身为民,卒不加劾”,《新唐书》改为“素贤之,不劾也”,“素”字是猜测;《书何易于》中“治益昌三年,狱无系民”,是体现出何易于治理益昌三年的成效,《新唐书》改为“狱三年无囚”,体现不出何易于治理益昌的功劳。储欣和汪师韩关于此文的评析,可谓各有千秋。当代有两篇文章评论了孙樵的《书何易于》与《新唐书·何易于传》的文章特色。江之浒、魏挽淑《文贵简约》认为,《新唐书》比《书何易于》简约,因为《新唐书》改孙文中“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”为“易于身引舟”,删去孙文中“歌酒”二字,改孙文中“百姓不耕即蚕”为“耕且蚕”都是省掉了不必要的字句,更为简约。《书何易于》后半部分400多字,《新唐书》仅仅用106字就写完了^①。对江、魏论文,王志华进行了批评,认为《新唐书》作者“全部略去了孙文的后一部分,即作者记述自己与益昌民对话的部分和作者直接发议论的部分”,是不符合孙樵“借题发挥,批评朝廷校铨选官吏的制度及其流弊”的目的的。而且《新唐书·何易于传》同孙文比较,“有些地方‘浓缩、提炼’得并不怎么高明和理想”^②。王志华的观点其实是更加详尽具体地阐释了储欣、汪师韩看法。

当然,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也时见疏于考证之处。比如汪师韩考察了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,从《旧唐书》中查到了相关资料,沿用了《旧唐书》的记载,《兴元新路记》修建者是“东川节度使郑涯、凤翔节度使李玘”。汪师韩没有考察《唐会要》的记载,所以没有继续考察《旧唐书》和《唐会要》记载的不同。当代学者李之勤在《唐代的文川道》一文中具体考察了其中的不同,并引用吴廷燮《唐代方镇年表》的考证,认为“当是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”^③。

①江之浒、魏挽淑:《文贵简约——谈〈新唐书·何易于传〉》,《宁夏大学学报》,1982年第2期,第43-44页。

②王志华:《也谈“文贵简约”》,《运城高专学报》1991年第1期,第21-22页。

③李之勤:《唐代的文川道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0年第1期,第115-134页。

汪师韩对《梓潼移江记》的考证是这样的：

按，文宗开成四年七月，西蜀水害稼。开成元年十二月，以兵部侍郎杨汝士充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四年九月，以京兆尹郑复代杨汝士为东川节度。按荥阳公者，郑涯也，涯为东川节度在大中时，岂涯此时为梓州郪县官耶？^①

一方面认为文中的荥阳公是郑涯，一方面又找不到郑涯在大中期间在梓州做官的证据，表示了疑惑。《唐方镇年表》就说郑复从开成四年（839）九月到会昌元年（841）六月任剑南东川节度使^②，《唐刺史考全编》也认为此荥阳公是郑复^③，解决了汪师韩的疑惑。

瑕瑜互见，优缺点鲜明，这是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的突出特点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是唐代古文运动尤其是晚唐古文运动研究史上的突出成果。所以，只有在驳正汪师韩的“孙樵古文伪作说”的基础之上，充分认识《孙文志疑》的成就，才能有效推进孙樵研究和晚唐古文运动的研究。

【作者简介】丁恩全，男，文学博士，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①汪师韩：《孙文志疑》卷四，叶二。

②吴廷燮：《唐方镇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005页。

③郁贤皓：《唐刺史考全编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030页。